

旧世界 新前景

——英国，共同市场和大西洋联盟——

〔英〕爱德华·希思著

旧世界新前景

英国，共同市场和大西洋联盟

1967 年哈佛大学戈德金讲演

〔英〕爱德华·希思著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 年·北京

Edward Heath
OLD WORLD, NEW HORIZONS
Brita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The Godkin Lectur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19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0

原书关于戈德金讲演的说明

为了纪念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1831—1902), 1903年在哈佛大学设立了关于自由政府要素和公民义务的戈德金讲座。讲演每年由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

内部读物

旧世界新前景

[英] 爱德华·希思著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印张 50千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151 定价: 0.30元

出版说明

希思从 1965 年担任保守党领袖后,就积极着手网罗人材、研究政策、制造舆论,为保守党重新执政作准备。1967 年他去美国,在哈佛大学作了三次讲演,正是他的舆论准备之一。这本小册子就是希思的这三篇讲演稿集,外加 1969 年付印成书之前希思本人写的一篇序言。原书于 1970 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部在伦敦出版。

希思这三篇讲演的中心内容:首先是强调英国与欧洲(指大陆)两者互不可缺,英国不同欧洲联合,则英国势孤力单,欧洲如果缺少英国,就是不完全的;其次,认为欧洲不仅应该结成经济联盟,而且应该进一步结成政治联盟,建立一支由英、法联合管理的核威慑力量;最后,是主张整个欧洲组成一个大联盟,并建立一整套防务体系,借以保持欧洲在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同美、苏两霸抗衡。

从 1973 年 1 月 1 日起,英国已经正式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被视为希思当政后的一项重要政绩。

从 1967 年之后,特别是在 1970 年 6 月保守党再度执政、希思担任首相之后,希思还有过多次的关于政策的讲演,但是他的对外政策的主要论点都已基本上包括在

这三篇讲演中了。所以，这三篇讲演仍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英国保守党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特予翻译出版，供有关方面参考。

1973 年 11 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新欧洲在形成中的困苦.....	11
第二章 未来的欧洲经济和政治问题.....	38
第三章 欧洲和更广大的世界.....	61

序 言

本书是我 1967 年 3 月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几个讲演。这些讲演，是透过最近的新闻标题对欧洲在寻求统一中已经到达的阶段进行深入考查的一个尝试。我特别打算追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从它的历史中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我也考查了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以及英国在欧洲的愿望是如何顺应英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总概念的。

依照正常情况，这些讲演本来是可以在讲后几个月之内出版的。但当英国政府几乎接着就宣布了它意图再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我觉得人们会把兴趣贯注在这些谈判的结局上。所以，对于其后出现的出版拖延，我是负有全部责任的。1969 年中期，当有人建议这些讲演仍然可以出版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已经过时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有进行大量的修改后才值得把它们付印出书。但是当我把这些讲稿重读一遍之后，我认为可以维持原来的样子不改，它们仍然包含着关于欧洲的见解的主要成分。

从 1967 年 3 月以来，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在欧洲问题上，它们却奇妙地使我们绕了一个圈子。现在象

1967 年一样，我们在欧洲正在就我们的未来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在两个主要平面上进行。一面是我们欧洲大陆都在辩论关于寻求欧洲统一的意义和内容。另一面是英国内部在辩论关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与明智问题，以及关于加入后将对我们未来的繁荣、安全和国家面目所造成的影响。先前的 1967 年的辩论，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就无形消失了。英国第二次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甚至还在谈判开始以前就告失败了。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则在完成关税同盟和艰苦致力于巩固一项共同农业政策时，它还未能取得远远超过这些范围的进展，以便建立起一个经济联盟或者为协调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奠定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辩论是否会同样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是否终将重新唤起欧洲如此迫切需要的那种势头。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除了有赖于我们行动上的毅力外，还有赖于我们思想上的明确。单纯就统一这个主题的雄辩就能对英国或欧洲大陆产生有用结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几次讲演，是把它们当作对上述思想明确化的一种可能的贡献而提供的。我将在这个序言里简单阐述一下，新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和英国同欧洲的关系这个特殊问题的分析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1967 年英国政府第二次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大概要被人们视为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件小小的

奇事了。既然戴高乐总统在 1963 年行使其否决权时会明确声明他是根据一般政治理由行事的,并且在 1967 年他依然保持着他的否决权,那么英国的加入只能根据两个假设中的一个才能实现,看来这是明显的。一个假设是戴高乐总统同他所有的公开声明相反,已经放松了他在政治上的反对理由。另一个假设是即使他坚持其反对理由,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五个伙伴,特别是德国,能够被动员起来说服或迫使他放弃这个反对理由。在局外的观察家看来,这两个假设在 1967 年讨论的任何时刻,好象没有一个站得住的。第二个假设似乎是英国政府的主要凭靠,依照我的看法,它来源于一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性质,特别是对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的误解。

这里不是对这次争论进行详细探讨的地方。只要指出 1967 年的尝试在英国有两个后果就够了: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积极结果是,工党第一次负起了要使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连同这件事对未来欧洲统一的影响的责任。因而下院于 1967 年 5 月,以包括所有三党领袖在内的压倒多数批准了这一政策。

消极结果是,第二次失败开始使英国舆论对整个这件事感到不满。许多人对一个曾经两次拒绝他们的共同体开始减低兴趣,这是自然的。这种不感兴趣的情绪,由于共同体本身明显的停滞不前而加剧了,共同体开始失去了它由于早先的成就而博得的某些魅力。

整个 1968 年和 1969 年初期,情况没有多大改变。

然而在这个时期，一些对欧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表明，对于欧洲统一的基本需要正变得更为迫切了。

这些事件之一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表明苏联仍然准备使用武力，以保护它只能用粗暴逻辑才能说明其必要性的各种利益。可以注意到，苏联侵略在西欧产生的反应要比在美国强烈得多。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不愿为保卫盟国而继续担负如此沉重的义务这种厌倦情绪正在增长的同时，只是苏联侵略才暂时止住了这种情绪。我在第三次戈德金讲演中，描述了这种对历史加于美国身上的负担不断增长的不耐烦情绪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在越南的悲痛经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欧洲防务的态度。在苏联行动对所有的人（除了盲目的人以外）表明决不能忽视欧洲防务的这样一个时刻，必然的结论是，欧洲各国必须努力做更多的事情来实行自卫。

在戈德金讲演中，我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主张合伙经营英法两国的核力量，以形成一支为欧洲保管的联合威慑力量。其后，我建议成立一个欧洲小组来实现这一点，对于联合英法力量，这个小组将被赋予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谓麦克纳马拉委员会今天对美国核威慑所行使的同样职能。这一安排，并不违反不扩散条约，因为它并不涉及给予无核国家对核武器的控制权。所以，这一建议不仅决不会引起同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破裂，而且还能够为目前存在于法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各盟国间的隔阂提供一种和解的手段。

我从未主张过这个建议好象就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条件。然而，我相信它会对更广泛的未来欧洲防务问题提供一部分答案。由于这一理由，我已敦促英国政府作好准备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各国政府讨论这些意见。使我感到鼓舞的是，同样的建议或这个建议的其他变换形式，近来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有影响的舆论中，已开始获得支持。

1967年以来对欧洲的另一主要压力是在货币方面。我作讲演之后八个月，英镑贬值了。今天写这个序言时，要对贬值能否较长期地改善英国的国际收支而得到成功这一点作出最后判断，仍然为时过早。贬值的效果，肯定比大部分提议者当时预言的要更为复杂，作用更为缓慢。英镑的贬值给了英镑制一个打击，从而使我在第二讲中谈到的英镑结存问题尖锐化了。1968年的巴塞尔协定，代表着国际上想把英国政府再也无法应付的局面置于控制之下的一种尝试。在这一安排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其他欧洲国家。如果英国在1967年象我在讲演中所提议的，同意讨论这种安排，那它除了会获得相当大的金融上利益外，也会获得相当大的政治上利益。

同时，由于英国负债的增加、美国连续出现逆差、法郎的贬值和德国陷入贸易过剩的倾向，所以在货币问题上继续存在着广泛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波及欧洲以外，并且引起了下述整个的问题：即世界各主要贸易国

家，是否能够找到比持久的美国逆差更为满意的国际通货供应的来源，这种逆差使美元不受管制地通过美元市场源源流入欧洲。

当法国更换总统时，这些赞成采取新行动来汇合欧洲各国政策的压力是很明显的。在写这个序言时，要断定蓬皮杜总统及其政府，在讨论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新进展方面，或者在同意与业已申请加入的各国进行谈判方面将灵活到什么程度，还不到时候。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法国政府在政策上不会有急剧的转变，它将同过去一样，继续坚决维护它自己关于法国的国家利益的概念。处理法郎的贬值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看来法国政府大概在同同意就申请国家的加入问题进行谈判以前，将坚持进一步澄清目前共同体内部的政策，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政策。

这种前景，对在英国的那些赞成英国有朝一日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人来说，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如果共同体加快步伐，并再次开始朝着经济和政治联合这个方向前进，它必将作出新的安排并发展新的制度，那时英国将在对这些制度的形成上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情况下被要求参加。另一方面，一个停滞不前的共同体，已经证明对英国舆论愈来愈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现在不是我提供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必须采取何种策略的时机。我相信，在1967年那次加入共同体的努力之前所作的这些讲演中的分析，对1970年或以

后的努力大体上仍然是有用的。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要求有远见和耐心的巨大事业。一个第三次的失败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进行任何正式谈判之前所需要的认真准备,甚至比 1967 年更为明显。把这些准备工作扩大到能够包括不直接属于罗马条约范围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也是这样。象我已力图说明的那样,正是在这些方面,例如在防务和货币问题方面,近来对欧洲的压力一直是非常强烈的。

同时,不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也有需要在公众舆论方面恢复在停滞年代中已明显地失去了的地盘。只有通过老实摆明前景,并且表明当我们说到欧洲统一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含糊的概念,而是指为了达到大家接受的目标而共同工作的习惯,这样才能做到恢复舆论的工作。如果我必须把这三个讲演的主题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这种共同工作的习惯是共同体的精髓;这是建立欧洲统一的唯一基础。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讲中,我描述了我认为欧洲对外部世界所应采取的那种姿态。我一直相信,以鼓励欧洲目光朝里为理由来批评欧洲统一运动,这是一种很不中肯的批评。我认为这一运动的主要辩护理由之一,是它会给欧洲提供条件,使它在外部世界中能够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当欧洲各国享受到合作的好处时,它们就会不仅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繁荣,而且对政治上的稳定——没有这种稳定,繁荣就是一个泡

影——有可能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就英国来说，自从我在哈佛大学讲演以来，英国曾经出现过一次挫折。1968年1月，英国政府决定，不顾它所承担的义务或政治形势怎样变化，它将在1971年年底从阿拉伯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撤退全部英国军队。显然，这个决定是在仓促中采取的，对这一决定在这些地区的后果没有作过任何认真的估计。这个决定，使得一场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的关于英国在海外的作用的争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这一争论，同曾经在美国进行的一个类似的争论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

在这两个国家中，这种争论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英国和美国，或者说真的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真被要求去帮助在全世界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体制，使变革能够在这一体制中和平地获得实现，那么，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它们提供这种帮助呢？事实可能是，过去英美两国政府，曾经几乎自动地承担了随时准备对困难中的友邦提供援助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努力没有计划好和没有做得很成功的情况，曾经好几次出现过。但是，我可以肯定说，从这些经验得出我们永远也没有兴趣再作这种努力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

当然，如果这种必要的稳定体制能够由联合国来完成，那是非常好的。如果不行，那么每个地区的国家可以在它们自己中间实现这种必要的平衡，而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种平衡中发展它们自己的社会，这肯定是可取

的。但是必须承认，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这两种情况都做不到。同过去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会有友好国家要求英国或美国帮助它们应付某种危及它们稳定的外来威胁的时候。这些请求总是会使我们的政府面临困难的选择。我相信，假定这种请求应该一律加以拒绝，就象假定这种请求应该一律有求必应，是同样愚蠢的。应该在每一事例中依靠政治背景来作出决定。

英国军队过去在阿拉伯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恰好是在一种政治上证明可以为该地区接受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那时政治环境合适，所以英国能够在不引起这些国家公民对抗的情况下，帮助过他们的政府对付外来的威胁，否则，这种威胁就会使对和平进步的任何希望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依我的判断，这是在同我们友邦的合作中，英国能够并且应该持续给予的一种有限的努力。我完全同意尼克松总统在向泰国人民讲话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忠实地履行我们的义务的决心，同我们对亚洲各国能够并且必须日益增加地肩负起在该地区获致和平与进步的责任的信心，是完全一致的。对我们智慧的挑战，是支持亚洲国家为保卫和发展它们自己所作的努力，而不试图取代本来应该属于它们自己的那些责任。如果说，侵略者的统治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自由，那么，过分依赖一个保护者也终究会侵蚀一个国家的尊严。”

当然，正象我在第三讲中所力求说明的那样，英国的这一论证只是一幅更广阔的图案的一部分。在帝国留下

来的直接影响下，欧洲大陆各国不愿再次使自己遭受海外的奚落和挫折，这是自然的。当欧洲的事业仍然处在半成熟状态的时刻，欧洲问题在这些国家的头脑中占有极大的地位，这也是自然的。但是，归根到底，欧洲要么朝外看，要么一事无成。欧洲在海外的利益已经非常巨大，它必然要对欧洲政策的方向发生影响。欧洲国家过去曾经倾向于把美国，以及在某些地区还把英国和法国，将提供必要的稳定体制以使它们的事业能获得繁荣，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深信，我们现在距离这种境地已经不远了，就是谁要指望从这种稳定中获得利益，谁就必须准备对维持这种稳定作出贡献。

爱德华·希思

1969年9月19日于伦敦

第一章 新欧洲在形成中的困苦

1826年12月12日那天，当时的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在下院说了这样一句难忘的话：“我促使新世界的产生，来恢复旧世界的平衡。”他当时正在为英国支持南美洲人民反抗一个本身已在法国支配下的西班牙帝国的权威辩护。如今，刚刚过了一百四十年后，我的主题把这个命题颠倒了过来。正是因为旧的世界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恢复新的世界的平衡，还因为我们必须努力在欧洲的古老民族国家之间，结成一个英国必须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广大的联合，我们大家才能为同我们在大西洋这一边的朋友们和盟国保持较好的平衡提供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随着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不一致的缩小，组成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共同体就有更大可能了。

在争取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统一的愿望背后，有三种原动力。

首先，永远结束民族主义对抗和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决心，这种战争曾如此长期地破坏了欧洲、给它的人民带来了绝望的苦难、并几乎毁灭了它的文化和文明。

其次，这样的认识：在新一代人中促使他们团结的那